

民办高校“智慧党建” 对工作（学习）卷入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认同度的中介作用

杨奎

(云南工商学院 云南 昆明 651701)

【摘要】在当前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浪潮下，“智慧党建”俨然成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趋向，是打造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党建平台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基层党建管理服务水平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运用 SPSS 24.0 统计分析软件，构建了“智慧党建”实效性模型，验证了云南省民办高校“智慧党建”程度与政治认同、身份认同以及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在“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呈现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民办高校；智慧党建；认同度；工作（学习）卷入度

1 研究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逐渐落实，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明显提升，服务能力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利用现代互联网构建“智慧党建”新模式，已成为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发展趋向（胡晓慧，2019）。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是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普及化的重要推动者与参与者，肩负着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源源不断培养应用型、技术型、复合型人才的历史责任。因此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基层党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水平和内涵发展质量。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探讨云南省民办高校“智慧党建”、认同度（政治认同、身份认同）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为民办高校“智慧党建”提供内涵式发展和品牌化策略提供可供操作性的建议。

2 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应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智慧党建”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党员信息管理、党务服务、党建活动、教育传播、

公共服务等智慧化平台，是“互联网+党建”的高级模式（庞旭方、戴丽华，2019）。王玲（2019）指出，基于5G网络的VR技术，能有效推进党建培训形式多元化、培训内容丰富化、管理服务智能化。门蕊、杜爽（2019）通过分析党员在线学习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实现智慧党建目标提供对策和建议。朱美荣（2019）指出，构建生态化“互联网+”高校智慧党建平台，加强信息管理、数据分析、主题教育等功能。赵祥志（2019）从高校党建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从顶层设计、基础设施、服务需求、形式内容、运行机制5个方面提出构建互联网+视阈下高校智慧党建工作的长效机制。邓晓、岳尧、贾彦峰（2019）提出了“1+1”高校智慧党建模式，即通过教职工党员和学生党员深入的内在互动性，发挥教职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培养学生党员的实践动手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创新精神，实现课堂育人、党建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思政育人的全过程育人理念（赵雪，2019）。鄢翔（2019）以云南普洱学院推广使用“云岭先锋APP”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切入点，从建立考核机制、开展智慧党建理论培训、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加入部分关键词的解释或说明四个方面提出了“移动互联网+”智慧党建的对策。

3 研究模型与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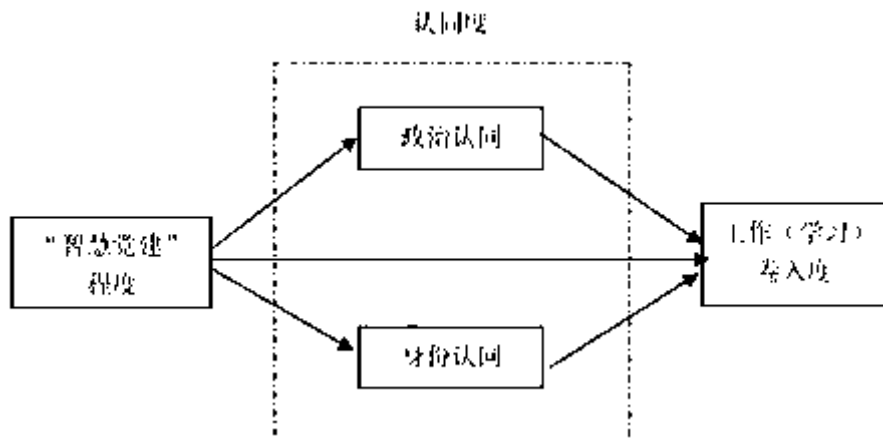


图3-1 “智慧党建”实效性模型

3.1 研究模型

本项目根据国内学者关于“智慧党建”、认同度以及工作（学习）卷入度的相关研究成果（陈阳，2020；王思佳，2019；彭婷，2019；徐明，2019），构建了云南省民办高校“智慧党建”实效性模型，其中自变量选择了“智慧党建”程度，因变量选择了工作（学习）卷入度，同时加入了认同度（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的中介变量，具体见图4-1。

3.2 研究假设

3.2.1 “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

目前关于“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相互关系，尚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部分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信息化管理系统与工作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占霞、黄嘉琳等（2020）通过研究发现，使用电子信息化管理系统有利于降低血液透析室护理人员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谢培杰、盛晓华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运用血液透析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护理服务的数字化、科学化、现代化，能有效提高透析室护理人员的工作适应力和工作投入度，从而提升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本文认为，“智慧党建”水平越高，文字、视频、动画等多样化的学习资源整合程度越高，更有利于提升基层党建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信息化、数字化等现代技术的应用，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党建工作与学科专业建设、学生服务管理等实际工作的有效融合，更好地发挥基层党建的服务管理水平和辅助决策水平，从而提升党组织成员投入党建工作和本职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基于以上研究，本项目提出以下假设：

H1：“智慧党建”程度对工作（学习）卷入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2.2 政治认同与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

杨晓霞（2015）认为，目前一些基层党组织流于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和“三会一课”活动，不仅严重削弱了广大党员同志的内部凝聚力和认同，更无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李业芳、郭清（2014）指出，目前高校教职工参与党组织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普遍偏低，提高教工党员的价值认同是提升其党组织生活参与度、体验度的有效途径。赵春鱼（2013）通过研究指出，高校教师组织认同包括三个维度：主动适应性为、情感归属和积极评价，而主动适应行为对工作卷入具有显著的作用。刘辉、陈梦倩等（2019）指出，农民工的工人身份认同与工作投入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徐明（2019）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认同对工作投入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毛献峰（2018）通过研究发现，高校科研管理服务中的编外人员身份认同对工作投入的预测作用显著。本文认为，“智慧党建”程度，特别是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线上学习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党员更有效、更广泛地了解党内外时事，强化自身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感和归属感，提升党员的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其参与基层党建工作和本职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基于以上研究，本项目提出如下假设：

H2：政治认同在“智慧党建”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H3：身份认同在“智慧党建”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4 调查问卷设计与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Likert 5级量表进行调查问卷设计，数字1-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各研究变量的题项设计主要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党建工作经历和基层党支部党建实际情况与特点进行了优化设计，共25个度量指标，分别对“智慧党建”程度、政

表5-1 各量表信度分析

测量维度	Reliability Statistics	
	Cronbach's Alpha	N of Items
“智慧党建”程度	.923	5
政治认同	.888	6
身份认同	.964	7
学业延迟满足	.904	7

表5-2 总体量表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815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5757.004
	df	300
	Sig.	.000

表5-3 “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24.936	1.509	16.527	.000
	“智慧党建”程度	.189	.074	.188	.011

a. Dependent Variable: 工作（学习）卷入度

治认同、身份认同和工作（学习）卷入度进行测量。

本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通过微信等网络通信工具发放电子问卷（问卷星），共回收问卷241份，其中为中共党员身份的问卷195份，有效问卷180份，有效问卷率92.31%。

5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此次调查中，中共党员共180人，其中男性51人，女性129人，占比分别为28.33%和71.67%，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就身份而言，教师81人，占比45.00%，学生96人，占比53.33%，其它3人，占比1.67%。从年龄分布情况来看，21-30岁111人，占比61.67%，31-40岁51人，占比28.33%。学历分布以本科为主，共105人，占比58.33%，硕士及以上63人，占比35.00%，专科及以下12人，占比6.67%。

5.2 信度分析

本文利用SPSS 24.0计算得出总体量表Cronbach α 系数0.945，说明了该问卷数据总体上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一致性；然后对各研究变量Cronbach α 系数值进行分析，显示其均大

于0.8。如表5-1可知，说明本文各研究量表选的项目设计较为合理。

5.3 效度分析和因子分析

通过对总体问卷数据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表5-2），KMO值为0.815，说明样本充足度高，Bartlett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 < 0.001$ ，表示本文研究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查阅、归纳和总结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和参考了“智慧党建”程度、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工作（学习）卷入度的成熟量表，结合本项目研究情景和云南省民办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实际特点，进行了简化、修正和优化，测量量表的适用性和代表性均得到了检验，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共提取了4个因子，与研究模型（图3-1）设计的4个研究变量完全吻合，每个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累计方差解释百分比达到76.512%，说明各变量的测量题项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Hair et al., 1992）。

5.4 假设检验

表5-4 “智慧党建”程度与政治认同的一元线性回顾分析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21.232	1.153		18.408	.000
“智慧党建”程度	.237	.056	.299	4.188	.000

a. Dependent Variable: 政治认同

表5-5 “智慧党建”程度、政治认同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6.465	1.925		3.358	.001
“智慧党建”程度	-.017	.058	-.017	-.291	.771
政治认同	.870	.073	.685	11.848	.000

a. Dependent Variable: 工作（学习）卷入度

表5-6 “智慧党建”程度与身份认同的一元线性回顾分析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24.923	1.520		16.395	.000
“智慧党建”程度	.328	.074	.313	4.403	.000

a. Dependent Variable: 身份认同

表5-7 “智慧党建”程度、身份认同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7.357	1.686		4.362	.000
“智慧党建”程度	-.042	.055	-.042	-.771	.442
身份认同	.705	.052	.735	13.439	.000

a. Dependent Variable: 工作（学习）卷入度

5.4.1 回归分析

根据“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表5-3），“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89，显著性水平 $P=0.011 < 0.05$ ， R^2 为0.035，说明“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显著正相关，即基层党建工作“智慧化”程度越高，党员参与党建工作和本职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和投入度越高，从而验证假设H1的正确性。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5.4.2.1 政治认同的中介作用

根据“智慧党建”程度与政治认同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表5-4），政治认同与“智慧党建”程度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37，显著性水平 $P=0.000 < 0.05$ ， R^2 为0.090。

根据“智慧党建”程度、政治认同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表5-5），政治认同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870， $P=0.000 < 0.05$ ，但是“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17， $P=0.771 > 0.05$ ，说明该系数不显著。根据温忠麟、王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原理，说明“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直接效应不明显，只有中介作用，即政治认同在“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从而证明假设H2的正确性。

5.4.2.2 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

根据“智慧党建”程度与身份认同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表5-6），“智慧党建”程度与身份认同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28，显著性水平 $P=0.000 < 0.05$ ， R^2 为0.098。

根据“智慧党建”程度、身份认同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表5-7），身份认同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705， $P=0.000 < 0.05$ ，但是“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42， $P=0.441 > 0.05$ ，说明该系数不显著。温忠麟、王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原理，说明“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的直接效应不明显，只有中介作用，即身份认同在“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从而证明假设H3的正确性。

6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智慧党建”程度对工作（学习）卷入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基层党建的“智慧化”程度越高，党员工作（学习）的卷入度就越高。

（2）政治认同在“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呈完全中介作用，即党组织“智慧党建”程度越高，党员的政治认同程度就越高，进而有利于党员的工作（学习）卷入度。

（3）身份认同在“智慧党建”程度与工作（学习）卷入度之间呈完全中介作用，即党组织的“智慧党建”程度越高，党员对自身的党员身份认知程度就越高，从而工作（学习）卷入度越高。由此可见，“智慧党建”有利于提升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升参与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和从事本职工作（学习）的投入度。因此在当前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基层党

组织要严抓党建工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党建”新模式，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数字化水平，促进党建工作与专业建设、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的深度融合，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Barry C. Burden, Casey A. Klofstad. Affect and Cognition in Party Identification[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5, 16(1): 36-45.

[2] Kannugo, R. N.. Measurement of Job and Work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2, 67: 341-349.

[3] Lodahl, T. M. & Kejner, M..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Job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65, 49(1): 24-33.

[4] Schaufeli, W. B., Salanova, M. & Gonzalez, V. R., et al. The Measurement of Engagement and Burnout: A Two Sample Confirmatory Analytic Approach[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2, 3: 71-92.

[5] 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ent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6] 陈阳. DY公司绩效反馈对员工工作投入影响的研究——组织认同的调节作用[D].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7] 李锐、凌文铨. 工作投入研究的现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02): 1013-1015.

[8] 庞旭方, 戴丽华. 精细化管理角度下高校“智慧党建”平台体系的构建与思考[J]. 改革与开放, 2019(20): 123-125.

[9] 彭婷. 公职人员政治认同问卷编制及其与自我认同、心理弹性的关系研究[D]. 贵州师范大学, 2019.

[10] 徐明. 企业员工组织认同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情绪劳动策略机制特质性调节焦点的作用[D]. 沈阳师范大学, 2019.

作者简介：

杨奎（1983.4~），男，河南省信阳市人，云南工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和消费者行为。

项目来源：

2020年度云南省教育系统党建工作研究课题《融媒体视域下民办高校“智慧党建”模式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0DJGX089）